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演变

刘雨婧 唐健雄[1]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从旅游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构建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旅游业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8—2019年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重新测度，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内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时序方面，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各维度指数波动性上升，水平及增长速度差异显著。(2)空间方面，下、中、上游地区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且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旅游业发展格局。(3)分维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呈下游、中游、上游递减，而旅游经济活力、共享发展呈下游、上游、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游、上游、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4)旅游服务、创新产出、收入福利、产业结构及环境治理是主要内部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依次递减，地域约束类型可分为五大类型。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旅游业发展质量 主导因素 投影寻踪评价模型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 旅游服务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2）04-0209-11

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国民经济换档期、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纵深发力期、全球旅游格局深度调整期和国家战略全面落实期的关键发展期，传统依托规模增长的旅游业已难以应对这一时期的复杂变化[1]，必须提升产业质量、切换增长动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旅游产业向高质量转型。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是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区域，同时有着“国际黄金旅游带”美誉，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总人数81.1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0.63万亿元，5A级景区126家，分别占全国比例的48.07%、47.70%和43.30%，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先行区和引领区。但当前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仍存在资源过度消耗、供需结构失衡、经济效率低下、碳排放量过高等突出问题。因此，在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科学测度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识别主要影响因素，以便进行针对性优化和升级，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的科学管理、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的关注点仍聚焦于旅游经济增长数量及质量的相关扩展研究，而从新时代视角，审视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研究略显不足。国外旅游发展质量研究始于1962年，时序上可分为3个阶段：1962—1989年为萌芽起步期，主要从服务业视角研究旅游服务质量[2]、消费者满意度模型及感知测度项目等[3]，研究成果不多，且偏向定性分析；1990年左右为研究兴起期，侧重于旅游发展质量的概念、内涵[4]、评价指标体系[5]、测度模型等[6]内容；2001年后为快速发展期，研究成果颇丰，侧重于旅游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7]，以及与价格、品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8]、旅游质量提升路径等[9]内容。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拓展，聚焦于以下方面：①概念内涵的探讨。阐述了旅游发展质量[10]、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旅游经济发展质量[11]等概念内涵。②旅游要素质量评价研究。旅游吸引物[10]、旅游服务、旅游环境[12]、旅游经济[13]等为关注重点，旅游者感知满意度调查[14,15]、统计数据[16]是主要支撑数据，灰色关联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是常用方法。③旅游发展效率研究。投入产出效率，体现了产业发展的有效性，反映了旅游产业结构的效率性。大多研究借助随机前沿（SFA）或数据包络（DEA)[16]方法，

[1]**作者简介**：刘雨婧（1990—），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及区域发展。E-mail:15580503845@163.com;唐健雄（1967—），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饭店运营。E-mail:293430686@qq.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GL149）;湖南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地理学-5010002）;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00505）

对酒店运营、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旅游资源、旅行社、旅游交通等相关旅游元素的发展效率进行测算与评价[17,18]，并揭示其空间特征及演化规律[19]。④影响因素研究。资源禀赋结构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3]，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外开放、财政支持、投资环境、市场化进程、制度质量等[20]因素也会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⑤其他相关研究。部分学者从旅游竞争力[21]、可持续发展[22]等视角揭示旅游发展水平的优劣，旅游竞争力被视为旅游目的地运营成功的关键，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旅游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此外，旅游发展质量提升途径[23]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综上所述，学者从众多方面对旅游发展质量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新时代旅游业发展质量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导向，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但目前现有旅游发展质量的测度体系，尚未将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考虑在内，大多从数量、规模、效率层面，较少从质量、效益、结构层面进行体现，因而旅游发展质量有待新测度；第二，作为一种能有效解决区域评价多元综合复杂难题的方法，投影寻踪评价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投资项目选择、医疗服务评价等多个领域，但鲜少用于旅游综合发展质量的测度；第三，长江经济带虽作为我国旅游业的领头者，但旅游相关研究较少获得关注，导致旅游发展质量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文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背景，基于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实际需求，从旅游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 6 个维度，构建能够体现高质量发展理念旅游业“新型”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法对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的发展质量进行“再”测度，重点研判其时空演变特征，识别其主导因素，旨在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1 理论基础与评价体系

1.1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理论基础

1.1.1 旅游业发展质量理论

质量，在物理学中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量的量度[24]，有微观和宏观质量，微观质量主要指产品质量，宏观质量指产业、区域或国家等宏观总体的行为状况及后果。发展，立足于变化，广泛用来描绘一定社会状况及所经历的变化过程[25]。旅游业是现代服务性产业，不同于农业和工业，它体现了游客与目的地之间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26]。因此，从“人地关系”视角，旅游业发展质量可以分为游客的旅游质量（人的要素）和目的地的旅游质量（地的要素）[27]。其中，游客的旅游质量侧重于微观质量，指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建构的主观感受，包括旅游产品、服务及体验等质量[28]。目的地旅游质量侧重于宏观质量，指旅游业对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影响，类型上包涵了客源、产品、企业、国际化、从业人员、配置效率等多个方面[29]。

高质量发展丰富了发展质量的内涵，是在新的发展环境、条件和阶段下提出的新要求，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质上更具丰富性和多维性[30]。同样，在新时代，旅游业发展质量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对其进行升华与丰富，可从民生指向观、经济发展观和系统平衡观三个视角来理解。①民生指向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层次逐步提高，对物质产品服务的需求由“有没有”变为“好不好”。旅游业被定位为“幸福产业”，优质的旅游产品及服务是旅游业朝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标志”和“刚需”[31]。②经济发展观。旅游业要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是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求旅游业由“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旅游业经济发展既包括旅游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等）的优化，还包括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稳定性能的提高，要求旅游业转变增长方式、切换增长动力、提升发展效率、稳定经济成果[32]。③系统平衡观。新时代，旅游业要高质量发展，不再是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而是旅游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生的全面提升，要推动创新发展成为主要动力，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成果共享成为根本目的[33]。

1.1.2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新要求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同时也是旅游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前提。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因此，新时代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必须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同时结合旅游业发展质量内涵、“三观”理念及区域旅游特性，既需要从微观视角分析旅游产品及旅游服务（统称旅游产品服务）的质量，也需要从宏观视角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关注目的地的旅游发展质量，综合形成科学、立体的标准系统。

1.2 构建旅游业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遵循综合性、系统性、层次性、可获取性等原则，围绕“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6 个子系统的内涵及特征，进行具体指标的提炼，尽量彰显旅游产业自身的特色，同时对指标表征内涵进行阐释，对指标来源进行标注，以架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具体测度指标中，旅游基础消费支出是旅游活动中住宿、餐饮、交通这三大基础性支出之和；旅游业社会固定资产，目前没有旅游业固定资产的综合核算，根据国民经济行为分类（GB/T4754-2002）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分类，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 个行业与旅游业发展极为密切，因此，对这四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汇总统计，综合表征旅游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34]；旅游业废水及废气排放量计算，因缺少直接统计数据，本文通过间接法得到，即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与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的乘积；旅游业碳排放主要产生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及旅游活动，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占旅游业总碳排放量的 67.72%、29.92%和 2.36%[35]，因此，主要基于这三个方面计算旅游业碳排放量，具体公式见相关文献[36]；居民旅游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参见孙根年等的研究[37]。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投影寻踪评价法

投影寻踪评价法（PPM)[42]，可以从不同角度寻找最大程度反映数据特征和充分挖掘数据信息的最优投影方向，能科学处理高维、非线性、非正态的数据，解决区域综合评估的多元复杂问题。计算步骤如下。

①指标归一化处理：

$$x_{(i,j)}=\frac{x^{*}_{(i,j)}-x_{\min}j}{x_{\max}j-x_{\min}j}\left(i=1,\cdots,n;j=1,\cdots,p\right)\qquad(1)$$

式中：$x^{*}_{(i,j)}$为第 i 个样本的第 j 个评价指标值；n、p 分别为样本数目的评价指标的数目；$x_{\max}j$、$x_{\min}j$ 分别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②构造投影目标函数。实质是 P 维数据 x(i,j),j=1，…，p 综合成 a=[a(1),a(2)，…a(p）]为投影方向的一维投影值 z(i)：

$$z(i)=\sum_{i=1}^{n}a(j)x(i,j)\left(i=1,\cdots,p\right)\qquad(2)$$

构造的投影指标函数为：

$$Q(a) = S_z D_z \qquad (3)$$

式中：S_z为投影值 z(i)的标准差；D_z为 z(i)局部密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S_z = \sqrt{\sum_{i=1}^{n} z(i) - u(z)/(n-1)} \qquad (4)$$

$$D_z = \sum_{i=1}^{n}\sum_{j=1}^{n}(R - r_{ij})u(R - r_{ij}) \qquad (5)$$

式中：a 为单位长度向量；u(z）为系列 z(i）的均值；R 为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u_t为单位阶跃函数，当 t=(R-r_{ij}）≥0 时其函数值为 1，当 t<0 时其函数值为 0，密度阈值（a）可以取 0.1S_z,0.01S_z,0.001S_z等。

③最佳投影方向。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其约束条件为：

$$s.t\sum_{j=1}^{p} a^2(j) = 1, a(j) \geqslant 0 \qquad (6)$$

式中：s.t.为约束条件，是以 a(j),j=1，…，p 为优化变量的复杂非线性优化问题，一般常用模拟生物优胜劣汰规划与群体内部染色体信息交换机制的遗传算法来求解。

④最佳投影值。将最佳投影方向（即权重）$a^*(j)$与归一化指标值 x(i,j)相乘，并累计求和即得到投影值 z*(i)，投影值越大则评价越高，在本文中，即旅游业高质量水平越高。

$$z^*(i) = \sum_{i=1}^{n} a^*(j)\cdot x(i,j) \qquad (7)$$

2.2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在分析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识别影响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识别，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43]。

2.3 数据来源

本文中 3A 级以上景区数、旅行社数、星级酒店数、入境游客平均停留天数、高等院校、星级饭店平均客房出租率等指标数据来源 2019 和 2020 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09—2018 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国家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根据历年国家相关部门的公布名单整理得到，每万人公交车数、客运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废水排放总量、SO_2排放量等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国家数据库 National Data(https://data.stats.gov.cn）以及 2009—2020 年大陆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文化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区三种旅游专利授权数检

索于“innojoy 专利搜索引擎”，以“旅游或旅游产业”为关键词，以中国发展授权为类别，对 2008—2019 年中国旅游产业的专利信息进行检索，然后根据授权时间及申请主体所在地分别确定每项专利所属年份及所属省份。

3 实证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时序演变特征

在新时代背景下，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法对长江经济带 2008—2019 年的旅游发展质量进行再测度，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呈快速上升态势，评价值从 2008 年的 2.870 上升至 2019 年的 10.162，年均增长率达 12.18%。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综合实力最强、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其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资源丰富，2019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接待人数占全国比例达 48.07%,11 个省市旅游总收入均值为 9667.92 亿元，远高于长江经济带以外省份的 5832.29 亿元，相应的星级饭店、旅行社和 A 级景区占全国比例分别为 39.52%、40.97%和 41.44%，旅游产业规模及创收效应优势突出。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旅游的累计次数为 120 多次，2013 年为 97 次，增幅为 23.71%，体现出各地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进入规模扩张、提质增效同步推进的重要时期。

旅游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旅游产品服务和旅游协调发展的高水平，两者的年平均值分别为 1.517 和 1.108，而旅游经济活力和旅游绿色发展指数的年均值约为 1.02，旅游创新发展与旅游共享发展指数较低，仅 0.7 左右。各维度指数变化情况为：①旅游产品服务质量快速稳定增长。评价值从 2008 年的 0.198 提升到 2019 年的 2.486，年均增长率为 25.83%，即旅游产品服务水平增长较快，当前水平较高。一方面长江经济带拥有丰富的旅游产品，名山荟萃、江河风光、人文古迹、古典园林等穿插组合，且品质较高。另一方面，旅游企业数量规模可观，供给较充足，省内外交通便捷、信息化水平高、公共博物馆等社会文化环境良好。其中，浙江表现最突出，2019 年浙江拥有 3A 级以上景区 681 家，四星级以上酒店 254 家，旅行社 2769 家，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16.72辆,丰富的旅游产品及良好的旅游基础设施,奠定了其龙头地位。此外,贵州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33.68%),主要是 3A 级以上景区增加迅速，意味着在全域旅游契机下，贵州各地加强景区管理、提高旅游服务，不断塑造“醉美多彩贵州”的旅游形象。

②旅游经济质量波动上升，总体质量不高。评价值在经历了 2013—2015 年的短暂低迷后，2016 年开始逐步好转，原因可能是 2013 年国家坚决执行“反腐倡廉”政策，给旅游经济带来了一定冲击，但也推动了旅游业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上海的旅游经济活力指数最高，入境游客与旅游收入占比均居首位，国际大都市的开放发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四川增长最快，得益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即着力打破低端锁定、降低门票依赖能有效破解西部旅游产业结构转型之困。

③旅游创新质量快速提升，但质量较低。评价值从 2008 年的 0.081 提升到 2019 年的 1.723，年均增长率达 32.06%，呈明显上升态势，11 省市旅游创新发展的 3 个指标（旅游 R&D 经费支出占比、旅游专利授权数、万人拥有旅游专利数）在 12 年间均大幅度提高，各区域旅游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大多数旅游企业科研实力有限，特别是中上游省份，对其他行业的技术渗透依赖性高，政府对旅游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也较少，难以满足旅游业对科技含量的需求，导致中上游地区旅游创新质量相对落后，制约了旅游创新水平整体的提升。

④旅游绿色发展质量变化不大。评价值由 2008 年 0.964 提高至 2019 年的 1.278，增长幅度较小，呈波动性变化。近年来，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因此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中的重点，但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工业集聚区，污染密集型产业沿江布局，大气污染、废水及碳排放等问题仍限制着旅游绿色水平的提高。

⑤旅游协调发展质量呈线性增长。评价值由 2008 年的 0.093 提升到 2019 年的 1.823，年均增长率为 31.02%。研究期内，

11 省市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值不断下降、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不断提升、旅客周转量所占比例逐步拉近。协调发展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旅游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全域旅游盛行背景下，大多省市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培育，特别是中上游省市从旅游产品、基础设施、城市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优化，与农业、工业、体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势头强劲，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比例提升显著，其中贵州已超过 50%，旅游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旅游发展水平逐步向下游省市靠近。

⑥旅游共享质量呈“W”型变动。评价值由 2008 年的 0.921 增长到 2019 年的 1.042，水平变化不大。2008—2014 和 2014—2019 年呈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形态，其中下游地区的旅游直接从业人数较少且变动较大，中上游地区的农村居民旅游收入弹性较低、居民旅游恩格尔系数的不规则变化等，共同限制了长江经济带旅游共享水平的提升。

3.2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空间演变特征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旅游业发展质量差异显著，整体呈波动性上升，大多省市旅游业发展质量在 2019 年达到峰值，变异系数呈波动性变化，2014 年变异系数达到最大值 0.642，随后逐步降低至 2019 年的 0.202，即旅游业发展质量提升显著，各省市之间的区域差异呈敛缩态势。一方面，反映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条件、经济水平等差异长期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各省市旅游业逐步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逐步协调、稳步提升，区域间的差异不断缩减。区域角度看，下游地区一直位居首位，年平均值为 8.589，中上游地区交替领先，在 2008—2009 和 2015—2019 年，中游地区的平均水平高于上游地区，2010—2014 年，上游地区领先中游地区，因此，区域层面大体形成了“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的空间特征（图 1）。下游地区一直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地区，原因在于优质旅游资源富集，文旅融合基础较好，接待水平及服务质量高，科技创新能力强，且经济实力雄厚、市场广阔，良好的区位条件及旅游发展优势奠定了其领导地位。另外，在旅游政策体系健全、旅游需求旺盛、假日制度完善等背景下，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逐步进入了规模和效益同步提升阶段。省市角度看，旅游业发展形成了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图 2）。研究期间内年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浙江（9.852）、江苏（9.418）、上海（9.184）、安徽（5.906）、重庆（5.419）、湖南（5.303）、湖北（5.224）、四川（5.214）、江西（4.839）、云南（4.324）和贵州（4.041），其中，浙江、江苏和上海 3 省市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远超其他省市，但其他省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增长速度看，贵州和上海的年均增长率最高，分别为 13.88%和 13.50%，江西和云南最低，为 10.53%和 10.31%。时序方面，结合各省市旅游业发展质量及其增长速度，发现上海、浙江呈“高水平、高增长”的变化，江苏呈“高水平、稳增长”变化，安徽、湖北、四川 3 省具有“中水平、高增长”变化特征，重庆、湖南的变化形态及节奏较为一致，呈现“中水平、稳增长”变化形态，贵州整体水平较低，波动性较大，“低水平、高增长”特征显著，江西和云南的整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属于“低水平、低增长”变化类型。此外，排序上看，将排序细分为 1～4（发展型）、5～8（成长型）、9～11（落后型）三个层次，并对层级变动现象归纳为平稳、上升和下降三个类型，发现下游地区除安徽省（波动上升型：落后型→成长型）外，其余省市均为发展平稳型；中游地区的湖北（落后平稳型）和湖南（成长平稳型）为平稳型，江西为波动下降型（成长型→落后型）；上游地区的重庆（成长平稳型）和贵州（落后平稳型）为平稳型，四川为波动上升型（成长型→发展型），云南为波动下降型（发展型→落后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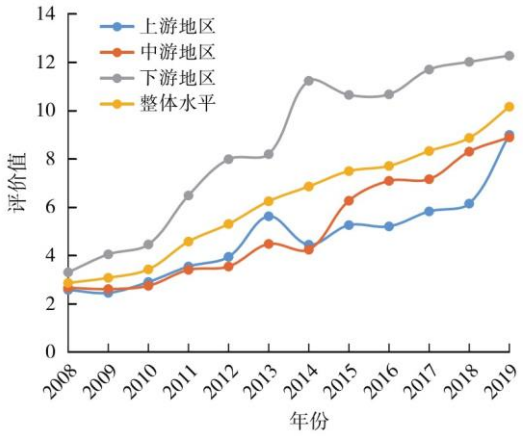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流域旅游业发展质量(2008—2019 年)

注：上游地区为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 4 省市；中游地区为江西、湖北和湖南 3 省；下游地区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 4 省市。

3.3 旅游业分维度质量时空分异特征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分维度指数呈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图 3）。总体水平：旅游产品服务、旅游创新发展、旅游协调发展呈下、中、上游递减，旅游经济活力、旅游共享发展呈下、上、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上、下游递减的空间分异。下游地区的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和协调发展表现较好，但工业化水平较高，绿色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中游地区旅游业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良好的绿色环境，以及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水平的持续优化，中游各省市大多属于人口大省，旅游资源相对丰富，吸引了较多国内游客前往，但国际旅游需求不足、资产生产率较低、基础消费支出占比较高、从业人员较少、城乡收入增长较慢等制约了旅游业发展，存在“中部塌陷”现象，但森林覆盖率较高，绿色发展持续向好。上游地区旅游发展动力来源于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力，以及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逐步优化，但受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影响，发展水平仍较低，但旅游收入增速明显、游客消费结构逐步优化等推动着旅游业发展。时空变化方面，下游地区在旅游产品服务、绿色发展方面表现较稳定，在经济活力和创新发展方面改善明显，在协调发展和共享方面有下降趋势；中游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表现较稳定，在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方面持续优化，在协调和共享发展方面表现低迷；上游地区在共享和绿色发展方面改善不明显，在服务产品、经济活力、创新发展及协调发展方面提升显著，发展潜力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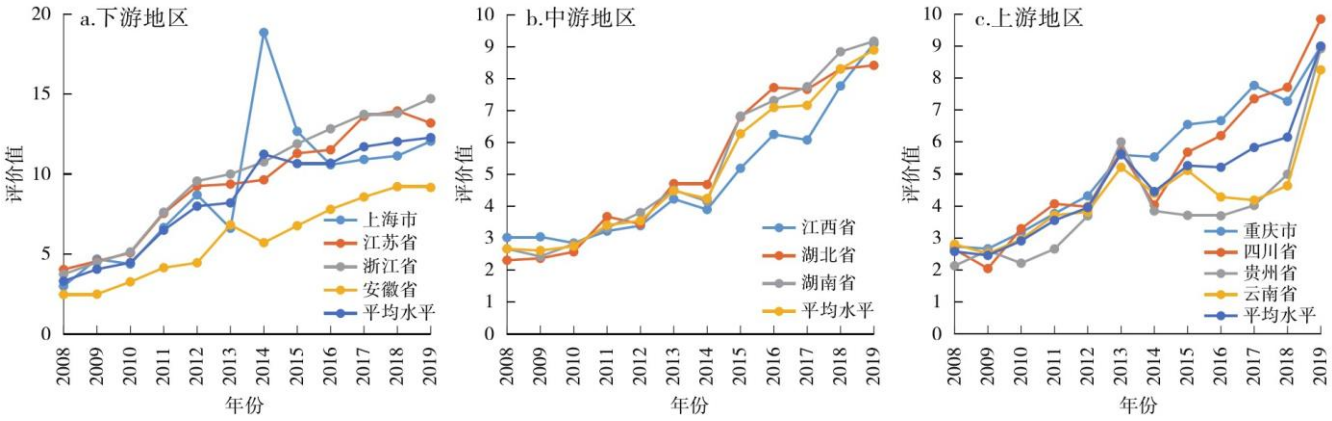

图 2 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旅游业发展质量(2008—2019 年)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制约因素，外部环境通过作用于内部因素，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内部因素则直接有效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本文从旅游业发展构成视角，即旅游业发展评价体系中挑选包含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经济增长速度等在内的 16 个要素指标，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法，先得到 16 个要素的评价值，运用自然断裂点方法，将 2008、2013、2018 和年均值的数据转换为序列数据，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得到旅游业内部因素对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

3.4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主导因素识别

①主导因素。结果显示，不同要素层的影响程度表现明显的差异。从内部因素作用的平均值看，排在前 5 位的影响因子是旅游服务、创新产出、产业结构、环境治理和收入福利，影响程度分别为 0.949、0.943、0.812、0.851 和 0.932，即旅游服务的

作用程度>创新产出>收入福利>产业结构>环境治理，这类因素的作用程度>0.8，可归为主导因素，其他因素的作用程度较低，可归为一般因素。旅游服务是影响游客主观感知的重要因素，也是旅游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旅游创新产出是旅游创新发展的成果展示，是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环境治理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优先”的重要手段，也是旅游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辅助力量；旅游收入福利是旅游发展最基本有效的民生福利，只有改善了旅游地民众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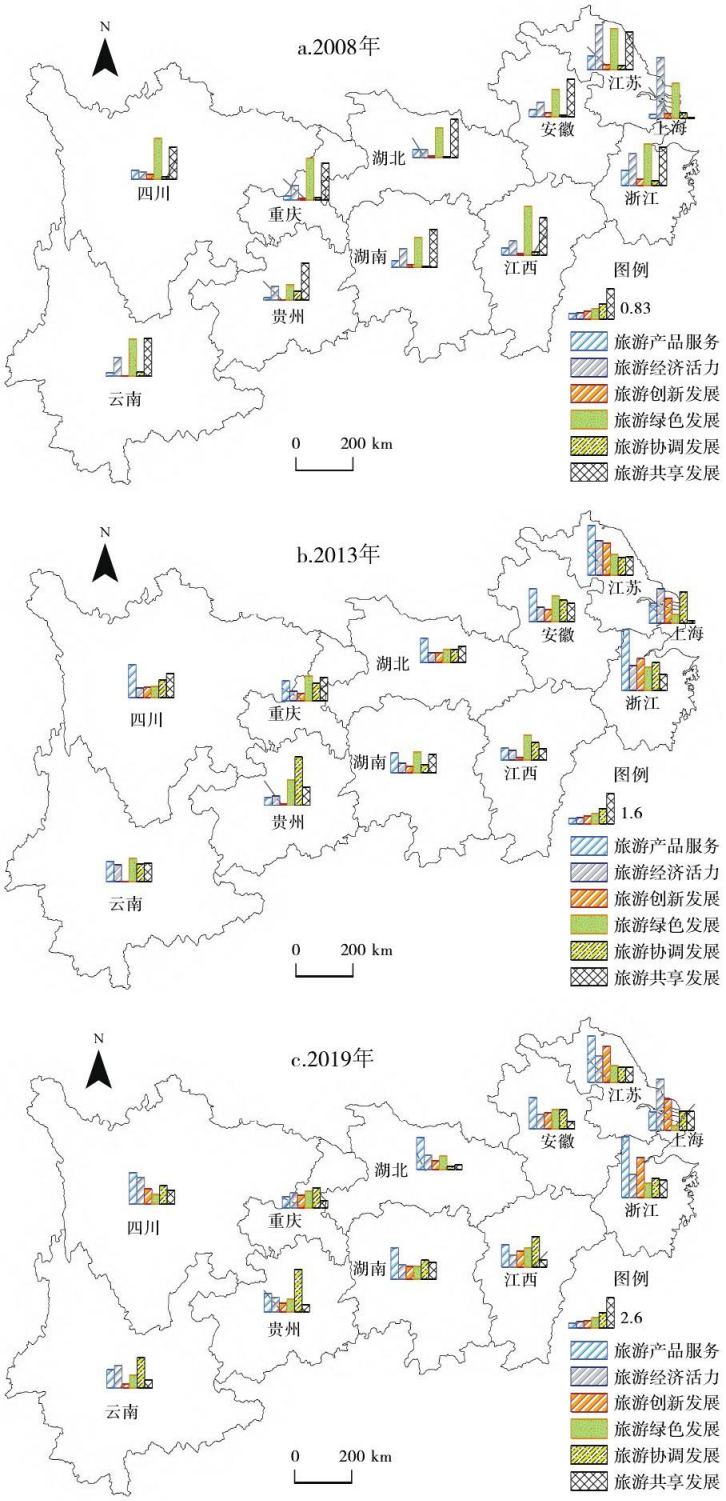

图 3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分维度质量空间分布格局(2008—2019 年)

②时序变化。基于 3 个年份的变化发现，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和主导因素均有所变化。具体来看，旅游服务、创新产出、收入福利在研究期间内大多为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区域协调、就业福利、休闲福利逐步由主导因素转为一般因素。此外，大多数一般因素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即研究期间内，资源配置、绿色环境、污染排放、区域差异等有所改善。但是，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环境治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增大趋向，说明“低频消费—低价格竞争—低品质供给—低游客满意度—更低频消费”的“大众旅游初级阶段”正在被时代抛弃，优质的旅游产品及服务供给仍不能满足游客需求，旅游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仍是长江经济带旅游工作中的重点。此外，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工业集聚区，环境治理是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应该追加投资、重点关注；旅游经济增长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旅游经济具有较强脆弱性，特别是上游各省市，旅游业的经济地位日渐提升，在重大事件突发时，其极易波动，对区域整体经济影响较大，如何提高旅游经济韧性、强化其稳定性也值得重视。

③地域约束类型。基于主导因素，结合各省市发展情况，研究区域可划分为服务约束型、创新约束型、结构约束型、环境约束型和收入约束型五个类型。服务约束型，因旅行社、酒店等接待设施不够完善，导致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不足，游客的满意度及体验感较差，江西、重庆、贵州属于这类型，这些省份山地丘陵较多，经济基础、交通设施等相对落后，但省内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旅游发展规模较快，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需求。结构约束型，主要是国际旅游市场份额较低，江西、四川、贵州 3 个省份属于该类型，这些省份旅游资源比较丰富，但区位条件较差、景点分布不集中、交通网络稀疏、机场数量少、吞吐能力有限等，导致国际旅游条件滞后，难以吸引大量国际游客到来。创新约束型，主要是旅游创新产出不足，湖北、湖南、云南 3 个省份属于此类型，这些地区的旅游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跨国研发机构较少，旅游创新动力不足，旅游专利授权数跟下游省市相比，差距较大，但近几年旅游专利授权数增长迅速，旅游创新潜力较大。环境约束型，主要是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归为此类，这些省市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高，同时工业化水平也高，污染治理投资增长缓慢，废水废气排放居高不下，旅游碳排放持续上升等，导致绿色水平改善不大。收入约束型，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远低于旅游收入增长率，重庆、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属于该类型，当地经济水平较低、自然条件较差，脱贫人口众多，城乡居民的收入难以与旅游收入同步增长。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从旅游产品服务、旅游经济活力、旅游创新发展、旅游绿色、共享及协调发展 6 个维度构建了新时代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对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旅游业发展水平进行再测度，重点研判其时空演化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识别主要内部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①时序方面，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从 2008 年的 2.870 上升至 2019 年的 10.162，年均增长率为 11.81%，各维度指数变动形态及增长速度均具有显著差异。②空间方面，区域层面整体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的空间特征，且区域间的差距逐渐减小；省市层面大体形成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旅游业发展格局。③分维度方面，旅游产品服务、旅游创新发展、旅游协调发展呈下、中、上游递减，旅游经济活力、旅游共享发展呈下、上、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上、下游递减的分布格局。④影响因素方面，排在前 5 位的主导因素依次是旅游服务、旅游创新产出、旅游收入福利、旅游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时序变化上，除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环境治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外，其他因素的作用程度呈降低趋势；约束类型上，区域大体分为服务约束型、创新约束型、结构约束型、环境约束型和收入约束型。

4.2 建议

①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绿色发展，当前旅游业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性变化，改善不明显。首先，

长江经济带要依托经济、资金、交通、技术等优势，引进低排放、低污染的旅游新技术、新理念，将智慧旅游理念融入旅游活动各环节，发挥旅游科技创新优势。另外，以全域旅游理念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如云南、贵州等地区积极申请设立生态旅游特区，争取更多国家政策支持，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的流动，构建有机、循环、低排放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旅游绿色发展。最后，健全旅游绿色发展监管体制和法律体系。建立旅游企业的绿色认证制度，旅游景区的环境预警和监管制度，生态旅游区的审计问责、公众监督机制，确保旅游业绿色发展底线和红线。

②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显著，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差异。因此，提升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各省市之间合作与交流，实现协调推进，还需要针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战略。其中，下游地区继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培育一批旅游创意企业，推出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景区，拓展潜在旅游市场；中游地区依托区位优势，深化与鄂渝长江三峡、泛珠三角等区域旅游合作，鼓励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合作，加大入境旅游市场开发力度；上游地区依托优质旅游资源，加速自驾游、旅游装备等新业态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康养产业、乡村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提升旅游业的规模、质量和效益。

③旅游服务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且影响程度居高不下。因此，针对中上游地区旅游服务短板，首先，因地制宜，围绕景点景区路网，建设一批集观景栈道、餐饮服务、特产销售、停车服务等于一体的旅游驿站，完善车站与景区之间的道路、码头、景区生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开通或增加A级景区旅游班车，从餐饮、住宿、接待、解说等方面制定规范统一、实用有效的旅游企业服务标准。其次，将分散景区景点和旅游资源串成线、集成团、连成片，增强酒店、宾馆等接待能力，强化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最大限度提升接待能力和效率。另外，对景区、酒店、旅行社等企业实行定人、定位、定经营范围的“三定”政策，促进规范管理、文明经营，探索“企业+居民”共同参与的管理体制，调动居民参与旅游管理和就业积极性，优化旅游管理体制，实现旅游共享。

参考文献：

[1]金准.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和方向[J].中国发展观察，2020(Z8):103-105.

[2]唐任伍，徐道明.新时代高质量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和路径[J].旅游学刊，2018,33(10):11-13.

[3]Baker D A,Crompton J L.Quality,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3):785-804.

[4]Keyser R D,Vanhove N.Tourism quality plan:An effective tourism policy tool[J].Tourism Review,1997,52(3):32-37.

[5]MacKay K J,Crompton J L.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recreation services[J].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1990,8(3):47-56.

[6]Herrera M R G,Sasidharan V,Hernandez J A A,et al.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pper Canyon,Mexico: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stakeholders and visitors[J].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8(27):91-103.

[7]Matzler K,Fuller J,Faullant R.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to alpine ski resorts: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ifestyle,spending and customers’ skiing skil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07,9(6):409-421.

[8]Croes R.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ontext of small island destinations[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1,50(4):431-442.

[9]Lloyd-Smith P,Schram C,Adamowicz W,et al.Endogeneity of risk perceptions in averting behavior models[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8,69(2):217-246.

[10]杨金华，章锦河，陆佩雯，等.后现代旅游理念下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以长沙县开慧镇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6):1287-1295.

[11]张爱平，钟林生，徐勇，等.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J].地理科学，2015,35(3):283-292.

[12]张业臣，张宏梅，宋子斌，等.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的时空偏差[J].自然资源学报，2019,34(11):2291-2304.

[13]刘英基，韩元军.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J].旅游学刊，2020,35(3):28-38.

[14]董楠，张春晖.全域旅游背景下免费型森林公园游客满意度研究[J].旅游学刊，2019,34(6):109-123.

[15]朱顺顺，章锦河，胡欢，等.旅游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效应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3):603-613.

[16]魏婕，李梦，任保平.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10):78-87.

[17]查建平，钱醒豹，赵倩倩，等.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研究[J].资源科学，2018,40(12):2461-2474.

[18]黄睿，王坤，黄震方，等.绩效视角下区域旅游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及耦合关系——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J].地理研究，2018,37(5):995-1008.

[19]马慧强，燕明琪，李岚，等.我国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时空演化及形成机理分析[J].经济地理，2019,38(3):190-199.

[20]李光勤，胡志高，曹建华.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局改委”政策评估[J].旅游学刊，2018,33(1):13-24.

[21]魏敏，李书昊，徐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省际旅游竞争力再测度——基于Promethee方法[J].商业研究，2020(2):91-100.

[22]李巍，韩佩杰，赵雪雁.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态脆弱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生态学报，2018,38(16):5894-5903.

[23]制造强国战略项目组.制造强国战略研究综合卷[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24]Yarbrough B V,Yarbrough R M.The World Economy:Trade and Finance[M].Singapore:Cengage Learning,2006.

[25]Gibson C.Geographies of tourism:(Un)Ethical encounters[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0,34(4):521-527.

[26]钟士恩，张捷，尹力杰，等.从旅游业发展质量看中国旅游现象与问题：兼探讨“游赏理念”的学科意义[J].人文地理，2014(6):125-133.

[27]Sánchez J,Callarisa L,Rodríguez R M,et al.Perceived value of the purchase of a tourism product[J].Tourism Management,2006,27(3):394-409.

[28]Spencer D M.Facilita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lanning on 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A case study involving the Nominal Group Technique[J].Tourism Management,2010,31(5):684-690.

[29]Kytzia S,Walz A,Wegmann M.How can we use land more efficially? A model-based approach to land-use efficiency for tourist destinations[J].Tourism Management,2011,32(3):629-640.

[30]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11):15-31.

[31]朱麟奇，李秋雨，刘继生.中国旅游业与地区发展及民生改善协调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2020,40(8):1328-1335.

[32]刘佳，王娟，奚一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化[J].经济管理，2016,38(8):160-173.

[33]于法稳，黄鑫，岳会.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0(8):27-39.

[34]贺腊梅，于萌，查建平.基于 BML 生产率指数的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26(12):1991-2002.

[35]石培华，吴普.中国旅游业能源消耗与 CO2 排放量的初步估算[J].地理学报，2011,66(2):235-243.

[36]马丽君，邓思凡.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碳排放与旅游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基于 31 个省区的比较[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3):225-232.

[37]孙根年，杨亚丽.2.0 版中国旅游恩格尔系数构建及时空变化研究[J].人文地理，2014(3):121-127.

[38]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态势及其驱动力[J].经济地理，2020,40(6):203-214.

[39]唐业喜，左鑫，伍招妃，等.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以湖南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1,37(6):641-647.

[40]阎友兵，胡欢欢.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21,37(1):5-18.

[41]刘佳，宋秋月.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与形成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8):127-137.

[42]程钰，王晶晶，王亚平，等.中国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研究[J].地理研究，2019,38(11):1-21.

[43]李莉，侯国林，夏四友，等.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3):683-697.